



## 上村嶺發掘的學術貢獻

林壽晉

一九七六年二月，作者經港省親期間，應鄭德坤、李田意諸教授之命，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了一次學術演講，題為「失落的國家——上村嶺的發掘」。今據演講提綱，增訂補充，撰成本文，改題「上村嶺發掘的學術貢獻」。

在中國，世世代代流傳着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二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時代，晉國的南面有虞、虢兩個小國。晉兵要經過虞國去攻伐虢國，便派人送「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給虞國的國君，請求假道。<sup>1</sup> 虞國的大夫宮之奇諫勸虞君道：虢國和虞國像唇齒相依，唇亡則齒寒，虢國如若滅亡，虞國就危險了。但虞君不聽忠告，反而與晉國聯合起來征伐虢國。結果，晉兵攻滅虢國後，接着也吞併了虞國。<sup>2</sup> 原來送給虞君的名馬良璧也回到晉國的府庫中。

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過去了，故事流傳着，而這個歷史悲劇的犧牲者虢國的確切地理位置究竟在哪裏呢？它的古老文化面貌又是怎樣的呢？却一直是個不解之謎。

一九五六年冬天，在河南省三門峽市上村嶺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兩件銅戈，戈上鑄有「虢太子元徒戈」銘文（圖三下，三右上）。這線索立刻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一九五七至五八年，作者主持的中國科學院黃河水庫上村嶺考古組與河南考古分隊，在上村嶺及其周圍，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大規模的發掘。經過艱巨的工作，終於發現了虢國的都城上陽，並在十數米深的黃土層中將一個龐大的虢國貴族墓地揭露出來（圖一）。

這是五十年代中國考古學上一項重要的發現。在墓地中，共發掘出包括太子在內的虢國各級貴族及其族人的墓葬二百三十四座，附葬的車馬坑四座；出土工具、武器、車馬器、生活用具、禮器、樂器、裝飾品等一萬四千餘件，木車遺跡二十輛。使一個失落

<sup>1</sup> 《左傳·僖公二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五，頁三九。

<sup>2</sup> 《左傳·僖公五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五，頁四二。

了二千多年的古國重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sup>3</sup>

上村嶺發掘對學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說，它「重現了被湮沒二千六百年的虢國社會和文化面貌，並填補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這段中國考古學上的空白期。」虢國是周代政治上最活躍，經濟、社會、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國之一，究明虢國有助於明瞭當代其他小國。然而，它於公元前六五五年被覆滅後，其烜赫一時的文明，却在時間的長河中消失得無影無踪了。除留下一個可供後人借鑑的故事外，人們對它幾乎一無所知。二千多年後，我們有機會將它從地下重新發掘出來，重新復活了，使世人首次知道其都城所在、建國年代、氏族關係、等級制度、風俗習慣、日常生活、製陶工藝、鑄銅工藝、漆器工藝、玉石工藝、玻璃工藝、交通工具、武器形制各個方面的情況，使世人首次瞭解我國上古時代一個典型小國的社會與文化面貌。再者，在中國考古學上，商代、西周、春秋晚期、戰國都有許多典型的遺址與墓羣，唯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直是個空白點，使我國的物質文化史中斷而不易聯接。上村嶺發掘恰好填補上這個重要的空白。上述兩方面，就是上村嶺發現對學術上貢獻。

上村嶺發掘對學術上的具體貢獻，可分下列十三項來討論：

### (一) 探明虢都上陽的所在

據《漢書·地理志》，虢有三處：「東虢在滎陽」，即今河南省滎陽縣一帶；「西虢在雍州」，即今陝西省寶雞一帶；「北虢在大陽」，即今河南省陝縣、三門峽市及山西省平陸縣一帶。<sup>4</sup> 因北虢地跨黃河兩岸，亦有人稱北岸為北虢，南岸為南虢，其實是一個虢，這點在拙著《上村嶺虢國墓地補記》一文中已詳加考證。<sup>5</sup>

發現上村嶺墓地後，我們在黃河南岸的陝縣、三門峽市，和北岸的平陸縣，展開了一系列的勘查及試掘，終於尋找出迷失了二十六個世紀的北虢都城上陽。它座落在墓地南面四公里半，黃河支流青龍澗北岸的台地上。這裏的地勢背山面水，開闊平坦，近水源而無泛濫之患。遺址東西長約一千三百米，南北寬約二百六十米。靠河部份包涵豐

#### 3 參見：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林壽晉執筆）：《上村嶺虢國墓地》（一九五九年北京科學出版社）。

林壽晉：《上村嶺虢國墓地補記》，《考古》一九六一年九期，頁五〇五至五〇七。

林壽晉：《上村嶺的屈肢葬及其淵源》，《考古》一九六一年一期，頁六二五至六二七。

Lin Shou-chin (林壽晉)，“Culture of the State of Kuo”《虢國文化》，*China Pictorial*, No.3 (1962), pp. 10-13.

Lin Shou-chin, “Relics of Kuo State” 《虢國遺迹》，*Peking Review*, No.42 (1958), pp.18-19.

<sup>4</sup> 《漢書·地理志》（百衲本），卷二八，頁一三。

<sup>5</sup> 林壽晉：《上村嶺虢國墓地補記》，《考古》一九六一年九期，頁五〇五。

富，文化層最厚的達三米，但因台地崖壁長期受河水侵蝕冲刷，其邊緣已非原來面目。北部灰層較稀薄，漢以後的堆積很厚。我們曾在遺址南側的中部開了三條探溝，發現有瓦頂建築及貯藏窖穴，並獲得許多陶製的生活用具。陶器皿中最常見的是鬲、豆、盆、罐，其陶質、製法、器形、花紋，與上村嶺墓地所出的大致相同。遺物的年代，大多與墓地同期，亦有小部份與墓地的年代下限銜接而略晚於後者。<sup>6</sup> 這說明，上陽的繁榮時期約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六五五年上陽被晉兵攻陷後，此都邑即迅速衰落。但城址中仍有少量居民繼續居住，並沒有完全被廢棄。

## （二）確定了北虢建立的年代

東虢與西虢的建國年代似無疑義，北虢的始建時間則是周史研究工作上一大懸案。《水經注·渭水》引《太康地記》曰：「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sup>7</sup>這條文獻影響極大，一千多年來幾乎形成牢不可破的傳統看法。以春秋史學權威著稱的清代名儒顧棟高也支持此說，他在其名著《春秋大事表》中道，虢始封時只有東西兩處，後西虢隨平王東遷，更封於陝州東南上陽城。<sup>8</sup> 但先秦文獻《國語·鄭語》却有一段相反的記載，它敘述西周末年史伯與鄭桓公的一節對話，史伯曰：「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sup>9</sup> 史伯列舉的八國，既被視為成周西面的屏障，況且「虞虢」並稱，此虢斷非成周東邊之東虢，亦非鎬京西邊的西虢，而是成周西面，虞國南側的北虢。依此，則北虢在平王東遷前業已存在了。

究竟北虢建於西周，抑建於東周？上村嶺發掘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墓地中發現了許多西周的器物。最明確的證據是1631號墓出的「虢季子子父乙」，<sup>10</sup>（圖四下，五）傳世有「虢文公子子父乙」<sup>11</sup>和「虢文公子子父乙」，<sup>12</sup>顯然，三者為同人之器，而虢季子子父乙就是虢國的國君虢文公子子父乙。因為同屬虢而有兩個子父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三器的字體，二鬲的形制花紋也完全相同。關鍵在虢文公是何時人？先秦文獻中涉及虢的記載有如鳳毛麟角，但在這關節上恰巧保存了一條珍貴的資料。《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sup>13</sup>《史記·周本紀》所記亦畧

<sup>6</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五〇。

<sup>7</sup> 《水經注·渭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一八，頁二五一。

<sup>8</sup>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藝文影《皇清經解》續編本），卷七四，頁一〇六二。

<sup>9</sup> 《國語·鄭語》（《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一六，頁一一八。

<sup>10</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三一，圖二七，圖版四一之1。

<sup>11</sup> 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一九三五年影本），卷上，頁二八。

<sup>12</sup> 羅振玉：《夢鄆草堂吉金圖》（一九一七年影本），卷上，頁一三。

<sup>13</sup> 《國語·周語》（《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一，頁五、六。

同。<sup>14</sup>由此證明，虢文公是周宣王時人，而宣王在位年代為公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可見，1631號墓的「虢季氏子鉶鬲」是西周晚年的遺物。

更重要的，是在七座墓中出土了七件I、II、III式銅鼎，同公認的西周標準銅器對照，其年代還在宣王之前。<sup>15</sup>而且，除一件III式鼎是實用器外，其餘六件都是明器。如果說，「虢季氏子鉶鬲」有可能是東遷時攜來的，那麼這六件明器則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明器都是死時或死前不久鑄造的，既不可能由先代傳下，也不可能數十年前預鑄明器而在數十年後的兵荒馬亂中攜來東土埋葬。這就確鑿證明，北虢在西周時業已建立了。

### (三) 解決了虢國氏族的某些問題

周代有一種特殊的氏族稱謂，始封兄弟如以排行爲字，其後裔每以始封者之字爲氏族稱號，如魯之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左傳·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杜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仲、叔，皆虢君字。」<sup>16</sup>金文除虢仲、虢叔外，還有虢伯和虢季，見「虢白（伯）乍姬大母鬲」、<sup>17</sup>「虢季子白盤」<sup>18</sup>及「虢季氏子組」鬲、<sup>19</sup>簋、<sup>20</sup>壺<sup>21</sup>等。是以知虢有伯、仲、叔、季四族，其中伯、季二族或與仲、叔二族平行，或爲後者之分支。

虢伯、虢仲、虢叔、虢季四族，與東虢、西虢、北虢三國，其間關係如何呢？《左傳·隱公元年》杜注：「虢叔，東虢君也……虢國，今熒（榮）陽縣。」<sup>22</sup>東虢屬虢叔一族，似無疑問。北虢、西虢究屬何族，則須進一步探討。《續漢書·郡國志》曰：「陝，本虢仲國。」<sup>23</sup>《水經注·河水》又云：「河南即陝城也……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爲南虢。」<sup>24</sup>歷代史家都從其說，認爲北虢屬虢仲一族。上村嶺發掘推翻了這個傳統觀念。在墓地出土的全部銘文銅器中，並無發現任何與虢仲一系有關的題銘；相反，却有虢季一系的題銘。這表明，北虢應屬虢季一族，而非虢仲一族。

再者，上述虢文公的族系，亦是一疑案。《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語：「文

14 《史記·周本紀》（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四，頁二四。

15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一三、四九，圖版一三之1、2，四〇之1，五八之2，六四之2。

16 《左傳·僖公五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五，頁四二。

17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九三七年影本），卷五，頁四。

18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卷三，頁八八。

19 梁上椿：《嚴窟吉金圖錄》（一九四四年影本），卷一，頁一四。

20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九三七年影本），卷八，頁七、八。

21 鄒安：《周金文存》（一九一六年石印本），卷五，頁五〇。

22 《左傳·隱公元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一，頁九。

23 《後漢書》收《續漢書·郡國志》（百衲本），志一九，頁一三。

24 《水經注·河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四，頁六四。

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又引韋昭曰：「文公，號叔之後，西號也。」<sup>25</sup>以墓地發現的「號季氏子鉶鬲」與「號文公子鉶」鬲、鼎對照，證實所引賈逵和韋昭二人之語皆有問題，號文公乃屬季氏一支。

#### (四) 究明了與蘇國的關係

蘇，亦稱溫，地望與北號相近，北號亡後五年亦滅於狄。<sup>26</sup>

在上村嶺，我們發現了兩件蘇國的銅器。一件是「鉶貉豆」（圖三左下），與「號爐口盤」同出於1820號墓。另一件是「鉶子叔鼎」，（圖三左上）出於1753號墓。<sup>27</sup>蘇器出於號國的墓地，而且其中一件還與號器共出一墓，可以肯定，北號和蘇國之間，必有某種關係。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著錄有「鉶甫人匱」，匱銘云：「鉶甫人乍爐妃襄𦨇匱」。<sup>28</sup>上述「號爐口盤」的銘文為：「號爐口乍寶盤子=孫=永寶用」。匱銘之「爐」與盤銘之「爐」同，即後之「姪」字。「姪」作叔姪之義是後起事，西周無此義。這兩個「爐」字非指鉶甫人之姪或號之姪，而是名字。「𦨇」即媵，義如今之陪嫁。匱是甫人嫁女之器，女字爐妃，名襄。適於何國？匱銘並未提及。現在，蘇甫人所嫁女的名字，與號器上的字相同，而該器又與另一蘇器共出於北號墓地的同一座墓中，無疑，此蘇女乃適於北號。另外，傳世還有「鉶冶妊乍號妃魚母」鼎<sup>29</sup>及盤<sup>30</sup>，都可作為旁證。它顯示，號娶蘇女並非偶見的事例，北號與蘇國之間存在着世為婚媾的關係。

#### (五) 周代嚴密等級制度的發現

《三禮》所反映的周代等級制度何時形成？其實際表現如何？這是周史研究工作上的大課題。上村嶺發掘對這方面有重要的新發現。

墓地的二百三十四座墓，依隨葬品的性質與厚薄，可嚴格地區分為八類：①一座，有七件銅列鼎（同出的銅編鐘九件、銅鬲六件、銅簋六件、車十輛、馬二十四）；②二座，（圖六）各有五件銅列鼎（同出的銅鬲四件、銅簋四件、車五輛、馬十四）；③三座，各有三件銅列鼎（同出的銅鬲、簋數目不定，或附葬車馬）；④十二座，無銅列鼎，但各有二件以上銅禮器；⑤十三座，各有一件銅禮器；⑥一百十九座，無銅禮器，

25 《史記·周本紀》（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四，頁二四。

26 《左傳·僖公十年》：「春，狄滅溫。」（《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五，頁四四。

27 《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三七、三八，圖三四、三六，圖版六二、六四之2。

28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九三七年影本），卷一七，頁二九。

2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卷五，頁二八〇。

30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九三七年影本），卷一七，頁九之一。

但有陶器皿；⑦六十三座，無銅禮器，亦無陶器皿，但有小件器物；⑧十座，無任何隨葬品。<sup>31</sup>

列鼎是周代獨特的禮制社會中的特殊產物。它是一組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銅鼎，祭祀或宴享時用以盛置不同種類的肉食。視使用者身份的高低，每組或九件，或七件，或五件，或三件。據《儀禮·聘禮》及鄭注，九鼎者，由大至小，依次盛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七鼎減鮮魚、鮮腊；五鼎再減牛、膚；三鼎再減羊、腸胃。<sup>32</sup>九鼎、七鼎，以牛為首，是謂大牢；五鼎，以羊為首，是謂少牢。除列鼎外，另一重要禮器就是殷。殷也是祭祀或宴享時盛置食物用的，但它與列鼎成奇數不同，都是偶數，每組或八件，或六件，或四件，或二件。

《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sup>33</sup>上村嶺第一類墓出七鼎，依鄭玄，應是諸侯之禮，但該墓的主人是號太子，這或由於號太子僭禮之故。第二類墓出五鼎，據何休，應是大夫一級貴族。第三類墓出三鼎，應是元士一級貴級。第四、五類墓仍有銅禮器，依「禮不下庶人」的原則，當是下士一類低級貴族。第六、七類墓無銅禮器，或是貴族的族人而屬於庶人身份者。第八類墓無任何隨葬品，或是貴族的近身奴婢。

西周早期墓已有等級，但似未發展至如此細密，也未出現列鼎。上村嶺發掘說明，嚴密區分等級並成為一套完備的禮儀制度，大概是西周中、晚期形成的。

## (六) 中原新葬俗的出現

世界各民族的葬俗中，有一種歷史很長，分佈很廣的屈肢葬，其主要特徵，是將死者的下肢屈成某種角度。它所包涵的意義，則不同民族，有不同傳說。

在中國，最早出現屈肢葬的地區是西北部的甘肅省和青海省。從四千多年前的馬家窯文化開始，那裏就盛行屈肢葬了。政和縣邊家溝、<sup>34</sup>蘭州白道溝坪、皋蘭縣糜峴地<sup>35</sup>及樂都縣柳灣<sup>36</sup>的馬家窯文化葬地中都會發現屈肢葬，其下肢彎曲的角度（即股骨與脛骨

<sup>31</sup> 林壽晉：《上村嶺號國墓地補記》，《考古》一九六一年九期，頁五〇六、五〇七。

<sup>32</sup> 《儀禮·聘禮》（《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八，頁八二至八九。

<sup>33</sup>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二，頁一二。

<sup>34</sup> J. G. Andersson (安特生)，“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史前中國研究》，*BMFEA*, No. 15 (1943), p.114.

<sup>35</sup> 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蘭州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一期，頁六、七。甘肅省博物館：《甘肅古文化遺存》，《考古學報》一九六〇年二期，頁一四。陳賢儒、郭德勇：《甘肅皋蘭糜峴新石器時代墓葬清理記》，《考古通訊》一九五七年六期，頁七、八。

<sup>36</sup>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葬第一次發掘的初步收穫》，《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頁六七至七四。

的內角)約45°左右或以內。三千多年前的齊家文化繼續行屈肢葬，武威皇娘娘台<sup>37</sup>及臨夏縣大何莊和秦魏家<sup>38</sup>的齊家文化葬地內都出現這種葬式，其下肢的屈度從十幾度到一百餘度不等。直至二千多年前的沙井文化，此葬俗仍然流行不絕<sup>39</sup>。

中原地區則相異，自新石器時代至西周前期，一直盛行直身葬。上村嶺發現了四十四座屈肢葬，其下肢的屈度大多在90°—135°之間，<sup>40</sup>這是中原地區流行屈肢葬之始。此後，從春秋至戰國，這葬式似由中原再傳播到中國的許多地區。

據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研究，葬式代表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及宗教意識，是不輕易改變的。中原世世代代流行了數千年的葬式，至西周晚期何以突然發生變化？這是饒有興趣，也是周代社會史和民族史上的大問題。

我們試着將上村嶺這項重要發現置於周代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西周末年，中國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即所謂諸戎，曾大舉東移，事見《左傳》及《史記》。至前七七年，諸戎的力量已强大到足以攻陷首都鎬京，殺死周天子，逼迫周王朝狼狽遷都。《史記·匈奴列傳》曰：「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sup>41</sup>《史記·周本紀》云：「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sup>42</sup>民族大遷移並不止於關中，而且越過今潼關而深入中原。《左傳·僖公二年》記「虢公敗戎于桑田」。杜注：「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sup>43</sup>可見戎已進入北虢境內。

內移的少數民族常與周地的民族相融合。《史記·秦本紀》：「(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正義：「小虢，羌之別種。」<sup>44</sup>是西虢的後裔與羌族融合。《水經注·河水》引《竹書紀年》：「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羌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sup>45</sup>戎人迎接芮君回

<sup>37</sup>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〇年二期，頁五五至五七。

<sup>38</sup> 黃河水庫考古隊甘肅分隊：《臨夏大何莊、秦魏家兩處齊家文化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六〇年三期，頁一〇、一一。正式報告見《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二期、一九七五年二期。

<sup>39</sup> 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史前中國研究》，*BMFEA*, No. 15 (1943), p. 204.

<sup>40</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四。

林壽晉：《上村嶺的屈肢葬及其淵源》，《考古》一九六一年一期，頁六二五至六二六。

<sup>41</sup> 《史記·匈奴列傳》(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五〇，頁三。

<sup>42</sup> 《史記·周本紀》(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四，頁二七。

<sup>43</sup> 《左傳·僖公二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五，頁三九。

<sup>44</sup> 《史記·秦本紀》(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五，頁八。

<sup>45</sup> 《水經注·河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四，頁六一。

國，可證戎族已成為姬姓芮國的居民。通過遷移、接觸、雜處和融合，西北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自然而然地傳入了中原地區。《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sup>46</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的四十四座屈肢葬，正反映並證實此影響深遠的歷史變化。前述考古資料表明，我國西北地區，自四千多年前的馬家窯文化，到相當周代的沙井文化，長期以來一直盛行屈肢葬。相反，中原地區，自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以至西周早、中期，皆不通行屈肢葬。恰巧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西北民族大舉遷移關中及中原時，中原地區突然開始流行屈肢葬。顯然，此新葬俗的出現，正是民族大遷徙的結果。<sup>47</sup>

### (七) 北虢製陶工藝的認識

新石器時代發明陶器後，人們的日常生活都離不開陶器，製陶業一直是古代社會最普遍的手工業部門。北虢亦不例外，無論在上陽城址或墓地中，都發現了數目繁多的陶製器皿或其碎片。上村嶺有一百二十座墓出陶器，共出土陶器皿五百二十二件。這些器物有兩大類：一類是炊煮器，有鬲和鼎兩種器形，約佔全部陶器的百分之十五。另一類是盛置器，有豆、盆、罐、壺四種器形，約佔百分之八十五。兩類因功用相異，故其製作工藝亦不同。

前者屬夾砂粗陶系。陶土粗糙，並羼入砂粒，以防炊煮時爆裂。除鬲的口緣經輪轉修整外，其餘部份多用手製。陶坯外壁會以纏繞小繩的木拍拍打結實，故留下明顯的繩紋。其中大部份器物燒製的火候不夠充足，表面多呈灰褐色；少部份燒製的火候比較充足，表面多呈黑灰色。

後者屬泥質灰陶系。陶土未經精細淘洗，沒有加入羼和料。以輪製為主，手製為輔。豆都有圈足，豆盤和圈足分別輪製，再結合成整體。器的外壁常有凹凸的亞狀壓紋，那是乘陶輪轉動時，用工具在陶坯上壓割而成。還有一種鋸齒形劃紋，則是以尖狀工具刻劃出的。這類陶器也是火候不足的佔多數，質地鬆脆，表面多呈灰褐色；火候充足的佔少數，質地堅實，表面多呈青灰色。<sup>48</sup>（圖七）

墓地的陶器，大多都是專為喪禮而製作的明器，只有少量是實用器。因為不求堅固實用，以故一般燒製的火候都不充足。上陽城址出土的供生人使用的同類陶器，其入窯溫度則較高，因而硬度也較高。

<sup>46</sup>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六，頁五一。

<sup>47</sup> 中原屈肢葬的起源，拙著《上村嶺的屈肢葬及其淵源》一文曾詳加考證。見《考古》一九六一年一期，頁六二五至六二七。

<sup>48</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六至一二，圖四至七，圖版四至一二。

### (八) 北虢鑄銅工藝的認識

上村嶺發現了五千多件青銅製品，有工具、武器、車馬器、禮器、樂器、裝飾品和雜器等（圖四，八，九）。其數量的龐大，和在社會生活上應用的廣泛，表明北虢存在着相當規模的青銅鑄造業。晉南、豫西古時曾蘊藏銅礦和錫礦，<sup>49</sup>虢國鑄銅業是否就地取材，也未可知。

我對出土的全部一百八十一件銅禮器作了考查，從銅器所存留的範土，和陶範接合處所形成的痕迹，判明這裏的青銅器皿都用拼合的陶範鑄造。其工序大致是：先以泥塑出一個與預期銅器一樣的模子，刻上紋飾，焙乾；將經淘洗的泥料塗敷在模子上，於半乾時切開，揭下，焙乾，就成為與模子花紋相反的外範；把分開的外範拼合成整體，加置內範以控制銅器器壁的厚度，在陶範外包裹厚泥以固定各範的準確位置，並預留注銅和排氣的洞孔；將銅料和錫料按一定比例混合熔化；把銅錫合金熔液注入範內；冷卻後拆範；最後對鑄成的銅器加工修整。

鬲、殷、壺、簋，都是二件一組，四件一組，或六件一組的。製作這種形狀、花紋、尺寸完全相同的成組器物，往往以同一模子翻出幾套陶範，再用每套陶範鑄造一件銅器。器身的外範數目（不包括耳、足、把、鈕等附件的外範），因器物的大小、形狀和結構而異。大抵底部都是一塊，腹壁的外範數，匝是二塊，殷二或四塊，鼎和鬲三塊，盤三或四塊，甗和簋四塊。器身與耳、足、把、鈕等附件的連結方法，依然承襲商代和西周前期的「渾鑄法」，祇有壺耳上套的環才採用東周後期盛行的「分鑄法」。所謂「渾鑄法」，就是器身和附件都是在同一組範中一次過鑄成的。「分鑄法」則是先鑄好器身，或先鑄好附件，或二者同時分別鑄好，然後用套範鑄接的方法，或金屬焊接的方法，加以結合。

北虢鑄銅業出現的新技術，是普遍采用中空式附件。耳、把、鈕類，除較細小者外，大多是中空的，其中空部份填充着範鑄時保留下來的範土。鼎、甗的足，多數也是中空的，中空處也填充範土；少數是內側帶凹槽的，槽內或留範土，或不留範土。祇有殷、盤、匜所附的小足，由於過於細小，才用實心足。這種工藝，可以降低原料的消耗，而中空部份填充的範土則可起加固的作用。另一種新技術是合範法的進步。由於可以精確地控制內範和外範之間的位置與間距，一般禮器的器壁要比商和西周前期的薄得多，最薄的祇有二毫米（mm.）。此法無疑也可以節省大量原料，並減低器皿的重量。

北虢的鑄銅工業雖然相當發達，但它畢竟是個小國，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再加上此

<sup>49</sup> 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六本，頁九六至一〇四。

墓地出土的大多是臨時倉促鑄成的明器，因而除少數製品較為精美外，多數器物都鑄造得比較粗糙，有的明器還帶着因銅液灌注不全而留下的洞孔。<sup>50</sup>

### (九) 發現了中國早期的漆器工藝

二千多年來，我國的漆器工藝，同絲綢及瓷器工藝一樣，是舉世無雙的。諸位必定在博物館或圖錄中見過精美華麗的戰國漆器，並為那些巧奪天工的技藝而嘆息不止。一種工藝臻於如此成熟的製品，必有一段由粗拙至完美的發展過程。戰國漆器的淵源何在呢？這是中國，也是世界工藝美術史上的重要問題。<sup>51</sup>

上村嶺在七座墓中，出土了十四件漆器，都已腐朽。我們根據遺留在土中的痕迹小心剝剔出來，以臘固定其形狀。其中六件是豆、四件是盤，另四件器形不明。豆高十餘厘米（cm.），每件豆的盤壁的外側都鑲着六枚用蚌殼磨成的圓泡。<sup>52</sup>（圖二上）經考查，它們都是木胎漆器，先以整木雕成器胎，再髹黑漆。此時尚未出現用薄板黏合的薄板胎，和用厚麻布作成的夾紵胎。從工藝技術看，長沙、江陵、信陽等地的戰國木胎漆器，<sup>53</sup>同上村嶺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木胎漆器，正是一脉相傳的。上村嶺的發現解決了戰國漆器的淵源問題。

據報導，藁城商代遺址會發現類似漆器遺物。然而，究竟是彩繪的雕花木器？還是真正的漆器？尚須進一步研究。<sup>54</sup>

### (十) 發現了中國年代最早的玻璃器

玻璃工藝最早出現於中近東，巴比倫於四千六百年前，埃及於四千五百年前，已使用玻璃製品。玻璃，中國古代稱琉璃，或流離，先秦文獻無記載。流離之名最先見於《漢書·西域傳》，<sup>55</sup>其製品至唐仍被視為珍貴器物。此工藝大概由中近東輾轉傳入。

洛陽、輝縣、長沙的戰國墓中曾出土一種飾以同心圓紋，俗名「蜻蜓眼」的玻璃

50 《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一二至一九。

51 《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一九，圖版四一之2。

52 參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學出版社）。湖南省博物館：《長沙楚墓》，《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一期，頁四一至六〇。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信陽長台關第二號楚墓的發掘》，《考古通訊》一九五八年一期，頁七九至八〇。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文物圖錄》（一九五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53 河北省博物館等：《河北藁城縣台西村商代遺址一九七三年的重要發現》，《文物》一九七四年八期，頁四七。

54 《漢書·西域傳》云：「（罽賓國）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百衲本），卷九六，頁一一。

珠。<sup>55</sup>但無法斷定是中近東輸入的，抑是本地仿製的？其後，長沙的西漢墓中發現了玻璃璧。<sup>56</sup>璧是中國獨有的器物，未見於世界任何地區，這玻璃璧絕不可能由外國輸入。可以相信，最遲至西漢，中國已建立了小規模的玻璃工業。

然而，直至上村嶺發掘前，人們從未見過早於戰國的玻璃器。上村嶺在五座墓中發掘出四十八件玻璃珠，其中菱形的四十四件，管形的四件，長度都在一厘米左右。它們或獨自綴連成串，或與玉、鷄血石、綠松石製成的珠飾綴連成串，作為項鍊、耳環等裝飾品。<sup>57</sup>這是迄今已發現的中國年代最早的玻璃器。它出現於北號墓地，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由中近東輸入；一是由中近東傳入技術而在本地自行製造。無論屬於哪一種，都是中國考古學和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發現：一方面，將我國使用玻璃器的時間推早三百年；另一方面，證明早到西周末，我國與中近東已有直接或間接的文化交流了。

### (十一) 發現了中國早期的銅劍與銅鏡

五十年代之前，無論發掘品，還是傳世品，都未發現有早於春秋晚期的銅劍；再加上《史記·秦本紀》有「簡公六年（公元前四〇九年）令吏初帶劍」<sup>58</sup>的記載；所以，學者或認為中國於春秋末葉以後才開始用劍。<sup>59</sup>一九五四年，我和科學院的同事在洛陽中州路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中發掘出一件有象牙鞘的銅劍，此發現將中國劍的出現時間提前了三百年。<sup>60</sup>一九五六年上村嶺號太子墓中出土了兩件銅劍，（圖一〇右）翌年上村嶺另兩座號國貴族墓中又各出了一件銅劍，從而將劍的始用年代再推至西周與東周之際。上村嶺四件劍的形制完全相同，其主要特徵是有一條凸起的圓脊，圓首無臘，直刃，全長二十九至三十九厘米。<sup>61</sup>一九五七年，長安灋西的西周早期墓中發現了一件銅劍，自此，中國劍的起源即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世紀。<sup>62</sup>之後，在寧城<sup>63</sup>及北京琉璃

<sup>55</sup> C. G. Seligman and H. C. Beck (薛利曼、貝克)，“Far Eastern Glass: Some Western Origins”《遠東玻璃，某些西方淵源》，BMFEA, No.10(1938), pp.1-6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一九五六年北京科學出版社），頁八二，圖版五四之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學出版社），頁六六，圖版三五之2、3。

<sup>56</sup> 同上《長沙發掘報告》，頁一二八，圖版九二之3、4。

<sup>57</sup> 《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二四，表二，彩版三。

<sup>58</sup> 《史記·秦本紀》（一九六六年藝文影黃善夫本），卷五，頁二二。

<sup>59</sup>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一九三五），頁五七一、六〇三。

<sup>60</sup> 林壽晉：《東周式銅劍初論》，《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二期，頁八一，圖三之1，圖版二。

<sup>61</sup> 《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一九，圖一二之1，圖版三五之1、四六之6、五四之4。

<sup>62</sup> 林壽晉：《東周式銅劍初論》，《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二期，頁八一，圖二，圖版一之1。

<sup>63</sup>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柳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二期，頁三二、三三，圖五，圖版六之1至6。

河<sup>64</sup>又陸續出土了十件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銅劍。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是銅劍的興盛時代，國內發掘到的此期銅劍已達一百餘件，傳世品的數量也很可觀。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則是銅劍的肇始時代，迄今發現的祇有上述的十數件，而屬於周代中心地區的僅六件，其中上村嶺就佔了四件。它們是研究中國劍的起源與演變的珍貴資料，是無價之寶。<sup>65</sup>

與劍一樣，長期以來，銅鏡亦被認為是後起之物。三十年代，安陽的殷墓中曾出土了一件帶鈕的圓形銅器，高去尋先生作了考證，確認為鏡。<sup>66</sup>一九七六年在安陽「婦好」墓中又發現四件殷代銅鏡，證明高先生的判斷完全正確。至於西周銅鏡，則一九五七年首次出現於上村嶺。<sup>67</sup>其中一件直徑六厘米多，背面鑄虎、鹿、鳥紋，有兩個平行的弓形鈕，出於1612號墓（圖一〇左）。由同出的兩件銅鼎判斷，此鏡必屬西周晚期。另兩件直徑約六厘米左右，背面平素無紋，有一個弓形鈕，兩件覆合，出於1650號墓死者胸前，年代約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sup>68</sup>嗣後，在寧城也出土了兩件與上村嶺同時代同類型的素面銅鏡。<sup>69</sup>以上的殷與西周鏡子，是迄今全世界僅有的十面中國早期銅鏡，是探討中國鏡的始源與演化的稀有標本。

## （十二）發現了罕見的玉石工藝品

在黃土地帶發掘堅穴墓的最大困難之一是：木棺槨全然朽成類似泥土一樣的「板灰」後，隨着上面填土的下陷，槨蓋、棺蓋和棺內三個不同層次的玉石飾，往往混雜在同一水平面上，從而擾亂了各組玉石自身的排列規律，使本來構成某種圖案的玉石飾，變成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此時，唯有依靠發掘者的技術、經驗和耐心，仔細地鑑別槨蓋、棺蓋和棺底「板灰」顏色的細微差異，辨別每件玉石飾上下面粘附的「板灰」，觀察各玉石飾的形狀、穿孔、位置、排列方向和相互關係，然後精確地區分出各個層次及各個組合的器物。

經過細緻的工作，我們在北號墓地清理出五千餘件玉石裝飾品，其中大部份都可按

<sup>64</sup>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隊：《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一九七四年五期，頁三一五，圖一四之4。

<sup>65</sup>關於中國劍的淵源，參見林壽晉：《論周代銅劍的淵源》，《文物》一九六三年一期，頁五〇至五五。

<sup>66</sup>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相關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九本，頁六八五至七二〇。

<sup>67</sup>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二期，頁七二，圖版一二之2、3。

<sup>68</sup>《上村嶺號國墓地》，頁二七，圖二〇之1至3、二一，圖版二三之1、2，四〇之2。

<sup>69</sup>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二期，頁三五，圖版一〇之8、一二之4。

其原來的組合、排列和串法予以復原。此類飾物是用鷄血石、大理石、綠松石和軟玉等雕刻琢磨而成。多數是綴連成串的，少數為單件裝飾品。（圖一三）它們被佩帶於身體的各部份，作用如今之項鍊、手鐲、耳環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組披於胸腹部的串飾，總長五十二厘米，橫十二排，縱十行，以五百七十七顆鷄血石珠和二十一件石飾組成。（圖一一）還有十組項飾，每組由雙行鷄血石珠間着單行馬蹄形玉石飾串成。（圖一二）這十一組串法別緻的玉飾，是考古學上前所未見的遺物，也是世界工藝史上的瑰寶。<sup>70</sup>值得提出的是，北虢社會上，不但女性，男性亦佩戴項鍊與耳環。虢太子遺骸的頸部就有一串上述的項飾，耳際各有一件作為耳環用的玉玦。<sup>71</sup>這是中國古代風俗史上一項有趣的發現。

### （十三）發現了中國古代保存最完整的木車遺跡

北虢處黃土高原地帶，車是主要交通工具。古時遺留的木車，在潮濕的黃土層中埋藏了二千多年，其木質不但已全部腐朽，而且因受土壤的長期浸蝕，外觀與黃土幾無區別。即使經驗非常豐富的田野考古學家，第一次遇到這種遺迹，也不易在普通黃土中，將含有木迹的黃土識別清楚。以故，三十年代在安陽、濬縣等地發掘車馬坑時，都難以剝剔出完整的木車遺跡。石璋如先生復原的「殷代第一類甲種車」，並非依據該車木結構的遺跡，而是以銅車飾的分佈位置，並參考五十年代大司空村的發現推想出來。<sup>72</sup>

首次剝剔成功的一九五〇年夏作銘先生在輝縣發掘的木車，<sup>73</sup>其後在洛陽、<sup>74</sup>灤西、<sup>75</sup>上村嶺、<sup>76</sup>安陽、<sup>77</sup>琉璃河<sup>78</sup>等地都相繼掘出商周時代的木車。迄今為止，所有

<sup>70</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二二至二五、四一·表二，彩版一至三，圖版二四至二六、二八、二九、六三。

<sup>71</sup> 《上村嶺虢國墓》，頁二八，圖二二。

<sup>72</sup> 石璋如：《小屯第四十墓的整理與殷代第一類甲種車的復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下冊，頁六二五至六六九。

<sup>73</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一九五六年北京科學出版社）。

<sup>74</sup> 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總九冊，頁一〇四至一〇七，圖一二，圖版一之3。洛陽博物館：《洛陽中州路虢國車馬坑》，《考古》一九七四年三期，頁一七一至一七八，圖一，圖版一至三。

<sup>75</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灤西發掘報告》（一九六二年北京文物出版社），頁一四一至一四五，圖九四至一〇四，圖版一〇四至一〇八。

<sup>76</sup> 《上村嶺虢國墓地》，頁四二至四七，圖三九至四一，圖版六五至七二。

<sup>77</sup> 馬得志、周永珍、張雲鵬：《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總九冊，頁六〇至六六，圖二三至二五，圖版二六至三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六一年二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新發現的殷代車馬坑》，《考古》一九七二年四期，頁二二至二八，圖一至三，圖版二、三。

<sup>78</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隊等：《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一九七四年五期，頁三一八至三二〇，圖一八、一九，圖版七。



中國古代木車遺迹中，保存最完整，剝剔最完全，因而復原最完善的，要算上村嶺的木車。因為，洛陽的木車本身已塌圯，灤西、琉璃河木車遺迹的上半部於發掘時被誤毀，輝縣、安陽木車有部份細節不清楚。而上村嶺木車遺迹，其所有細部結構，甚至各木件之間的微小榫卯構造，都是完整無缺的。

上村嶺發掘了三座車馬坑和一座馬坑，其中一座車馬坑有十輛車和二十四馬，另兩座車馬坑各有五輛車和十四馬，馬坑祇有兩匹馬。車都是木製的，為兩匹馬駕的雙輪獨轅車，全長約三米，軌寬一·五五至二·一五米之間。輪是以輻條支撐的，兩輪間貫以軸木。轅的後部壓在軸上，轅的前端置衡。衡兩側各有一木軛，用以駕馬。輿是長方形的，四周有欄杆，後面有缺口，供乘者升降。（圖一四、一五）

一九五六年發現北號墓地，至今已二十年。二十年來，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各個領域內都有重要的新發現；唯獨西周末至春秋初這一階段，仍然沒有超乎上村嶺的工作。直至今日，上村嶺發掘依然是這個時期考古學上最重要、最有系統和最有價值的發現。





##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the Excavation at Shang Ts'un Ling

(A Summary)

Lin Shou-ch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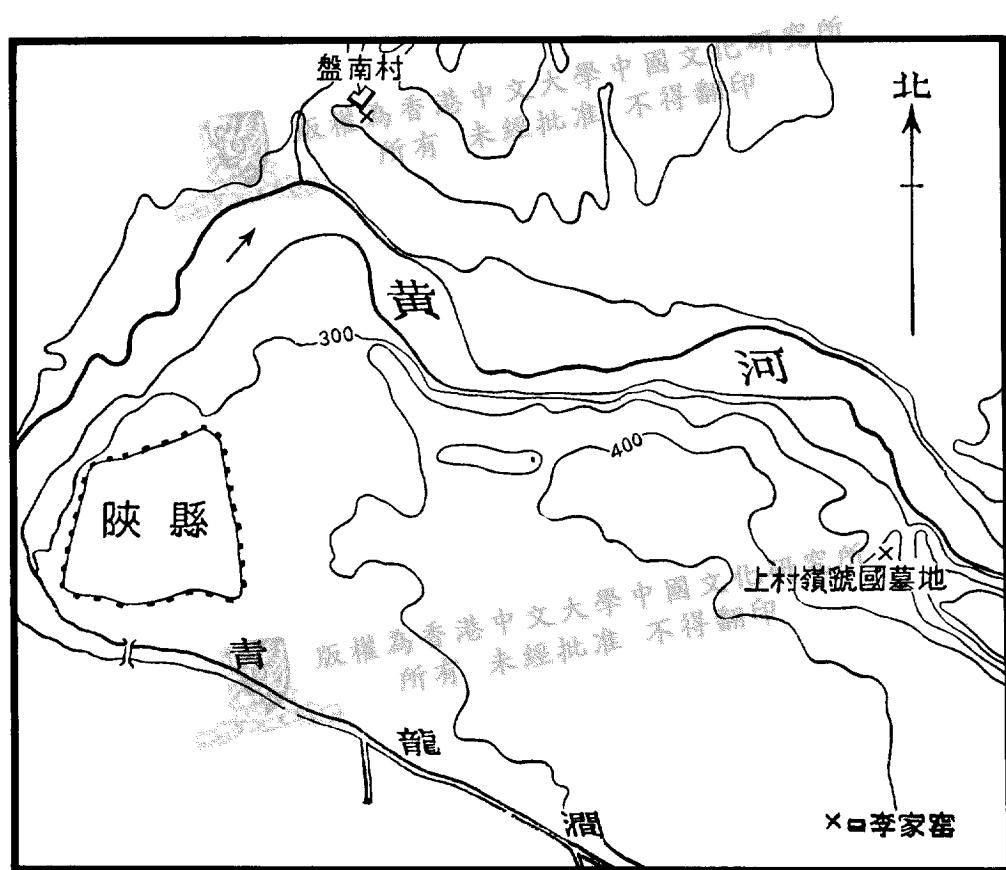
In the Chou Dynasty, there was a well-known State of Kuo in the middle Huangho Valley. It was later invaded and destroyed by the powerful State of Chin in 655 B.C. As a result, the distinguished civilization of Kuo vanished completely.

In the 1950's, after a series of field explorations,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der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e capital town of Kuo, Shang-yang, at the present-day Li Chia Yao Village, City of San Men Gorge, Honan Province. A sizable cemetery of the Kuo nobles was at the same time excavated from a depth of over fifty feet of the loessland at Shang Ts'un L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richest fin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From the graveyard were unearthed a total of 234 tombs of Kuo nobles and their kinsmen (including that of the Crown Prince of Kuo), four pits of horses and chariots, over 14,000 pieces of remains of tools, weapons, chariot-fittings, household vessels, ceremonial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rnaments, and the remains of twenty chariots. An ancient state that had been lost for two thousand and six hundred years is once more exhibited to the world.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xcavation at Shang Ts'un Ling can be evaluated from various aspects. In general, it sheds new light on the hazy history of Kuo'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at had remained unknown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It also fills a gap in China'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 period that has long been a blank from the late Western Chou Dynasty to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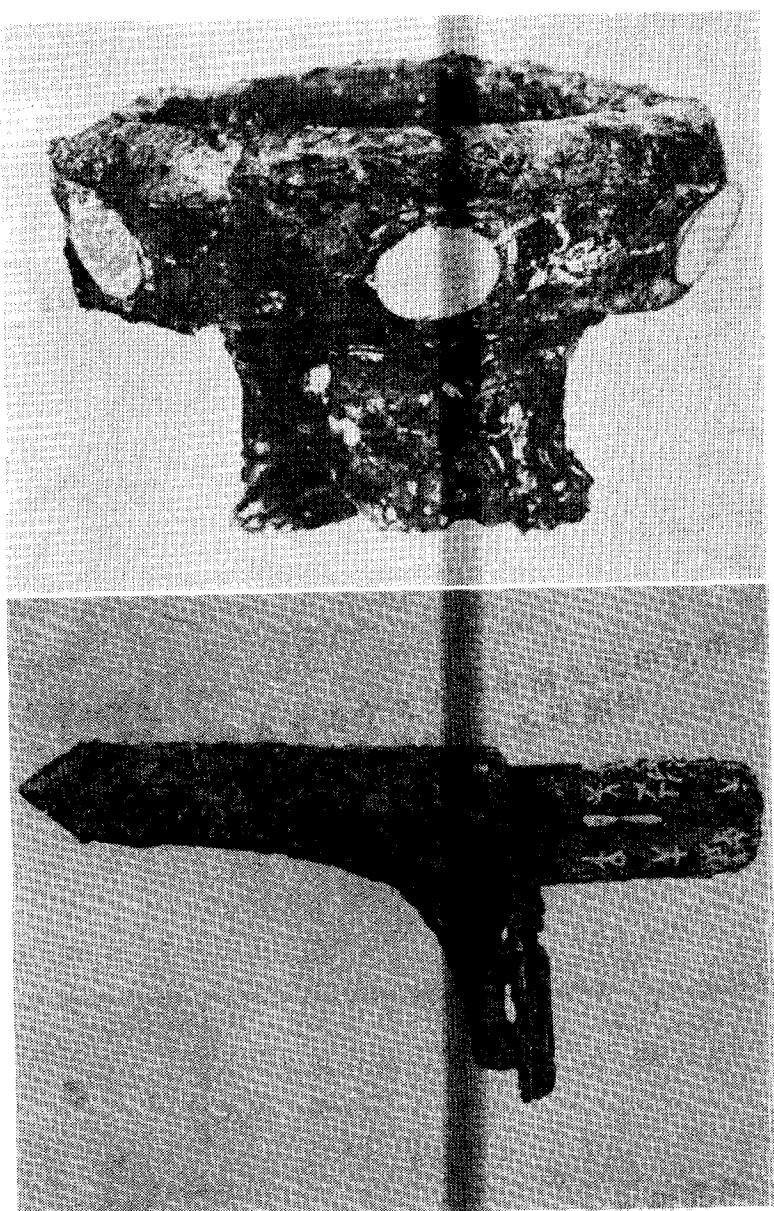
Based on the solid contributions of the excavation, this essay brings a full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13 topics: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Kuo — Shang-yang,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act historical period, of Northern Kuo,
3. The solution of certain problems that had existed in the Kuo clan,
4.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ing families of the states of Su and Kuo,
5. The rigid class system in the Chou Dynasty,
6. The emergence of new funeral rites in Central China,
7. The technique of pottery-making of Northern Kuo,
8. The technique of bronze-making of Northern Kuo,
9. The discovery of the earliest lacquer-works in China so far,
10. The discovery of the earliest glasswares in China so far,
11. The discovery of early bronze swords and mirrors in China,
12. The discovery of the use of precious stone ornaments in ancient China, and
13.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hariot used in the eighth century 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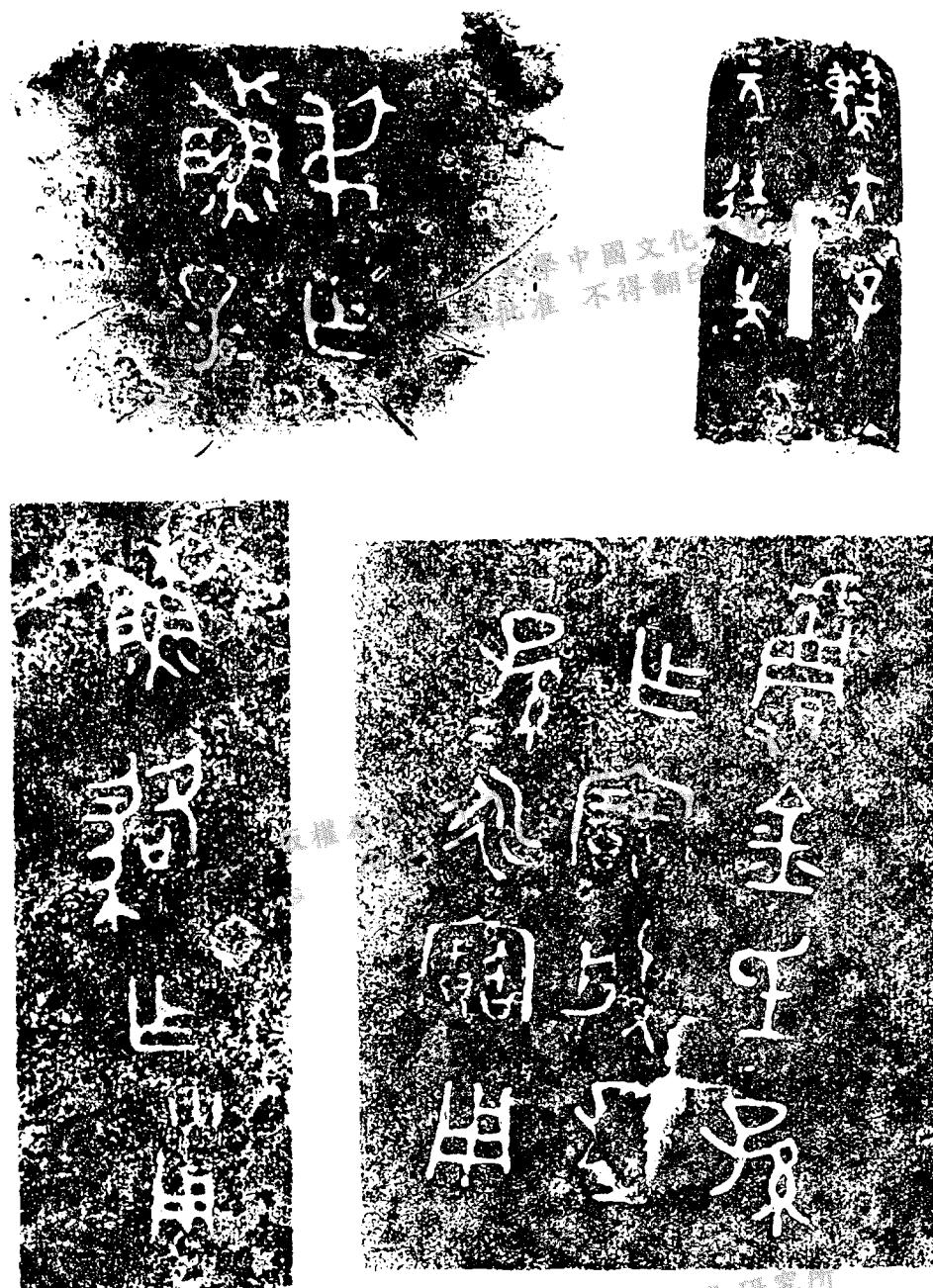
圖一 上村嶺北號墓地位置圖

圖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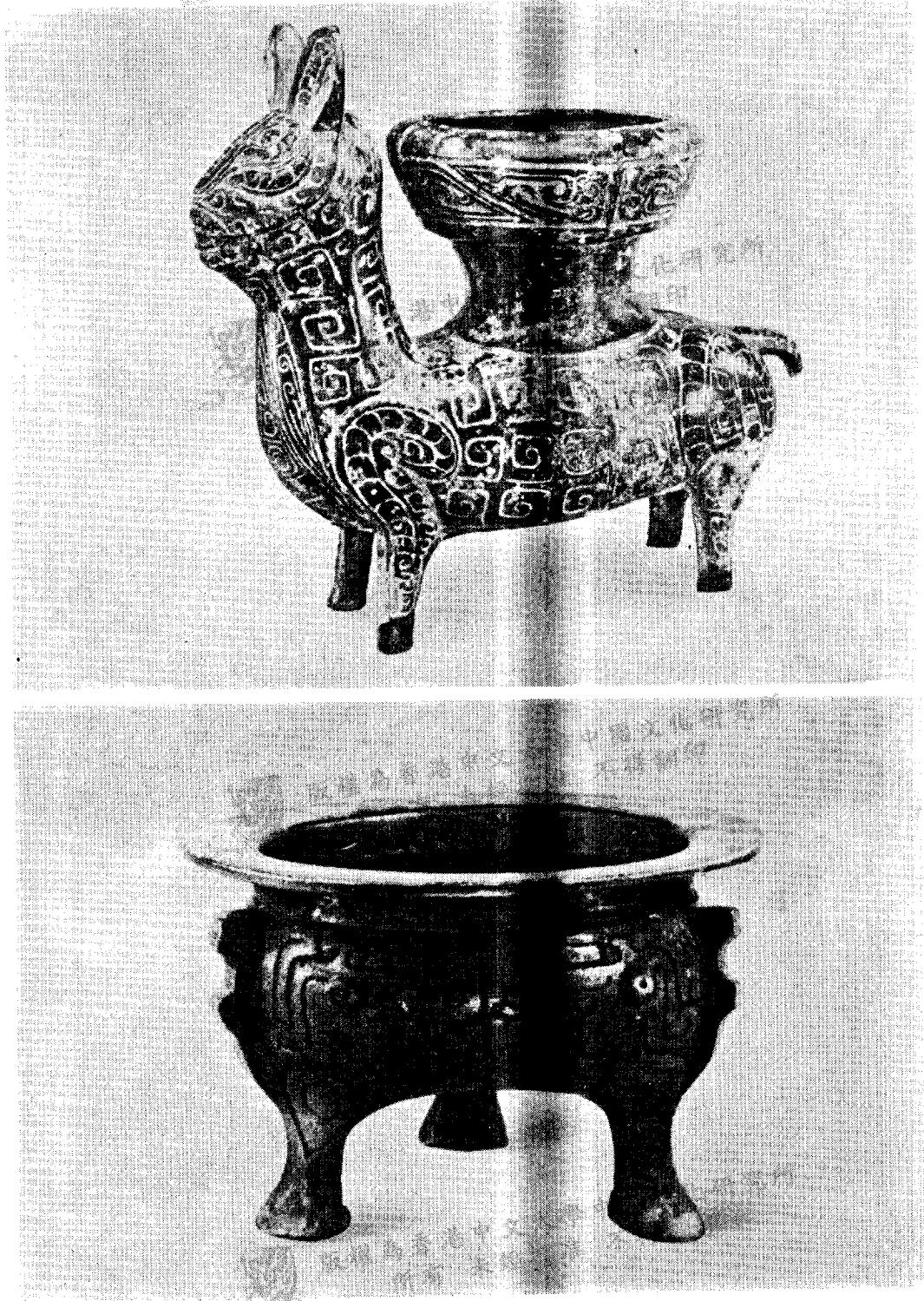
圖二 上、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下、號大孚元徒戈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  
圖三為香港中文大學上村領部份銅器銘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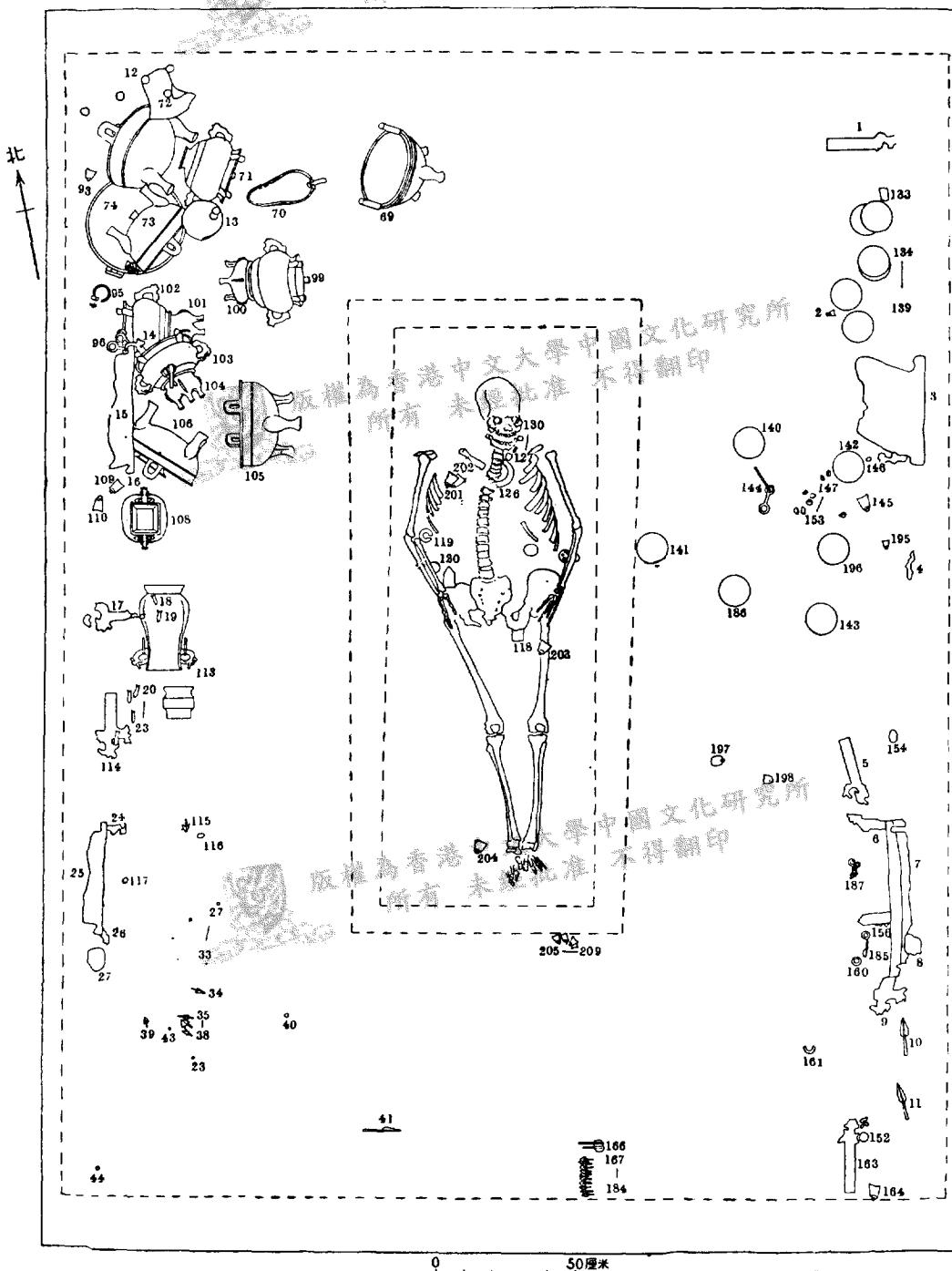
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四 上、獸 器 形 下、號季氏子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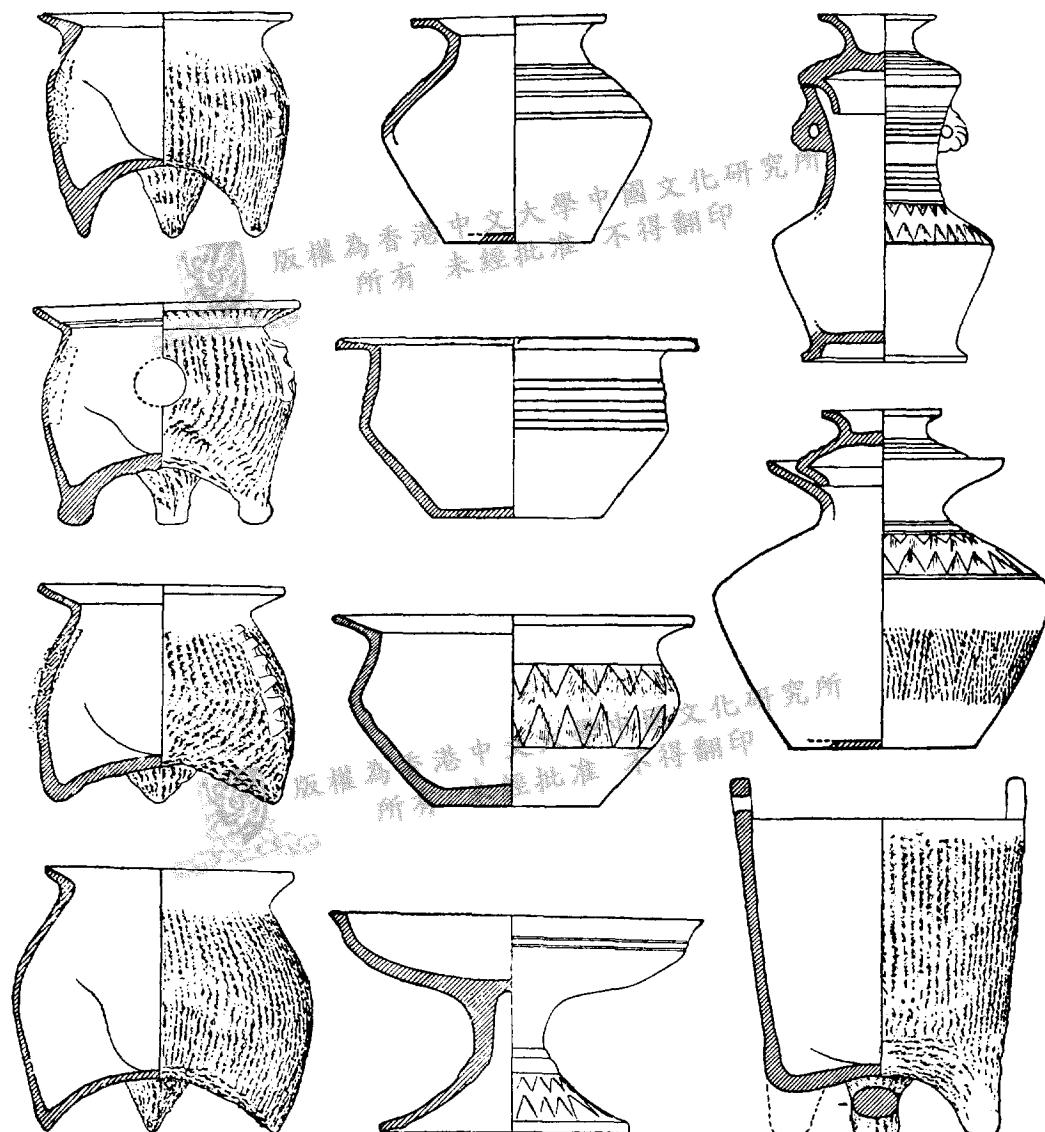
圖五 號季氏子鍛扇銘文



1—3—9, 12—17, 24—27, 114, 163. 銅鄨飾 2, 93, 109, 110, 145, 164, 195, 201—209. 銅鈴 10, 11. 銅矛  
18—23. 石魚 33—44, 115, 156, 167—184. 銅鑊 69, 72, 73, 105, 106. 銅鼎 70. 銅匜 74. 銅盤 71、  
99, 102, 103. 銅蓋 100, 101, 104. 銅鬲 94, 95. 銅環 96, 144, 187, 160, 161. 銅銜 108, 113. 銅壺  
116, 146—153. 石貝 118, 120. 石戈 126. 石璜 127. 長方形石飾 119, 130. 玉玦 134—143, 186,  
196. 銅甲泡 154, 197, 198. 銅合叶 166. 銅轄

圖六 第1706號墓底平面圖

圖七 上村嶺陶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上村嶺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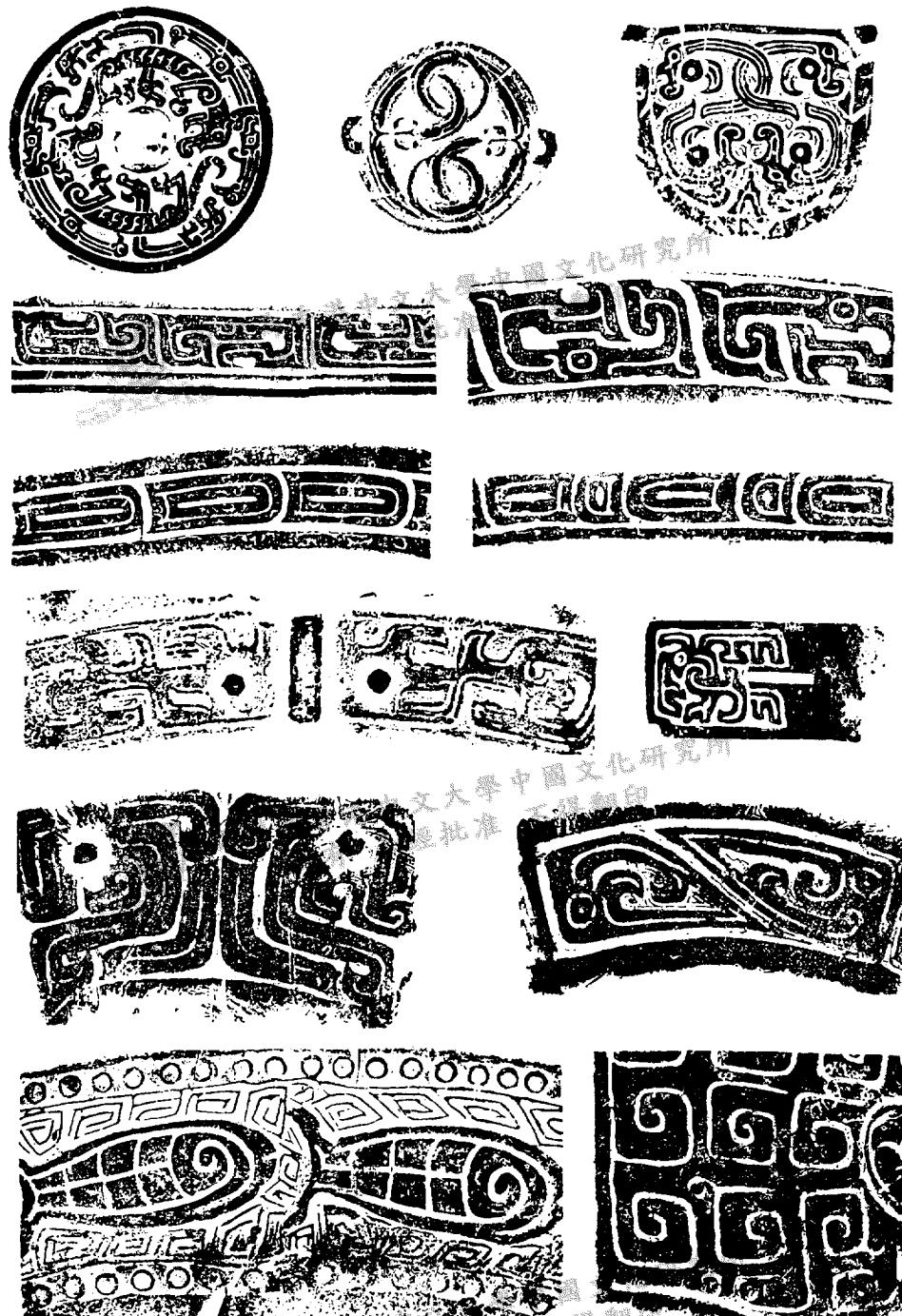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八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八 上、虡金氏孫匜 下、虡金氏孫盤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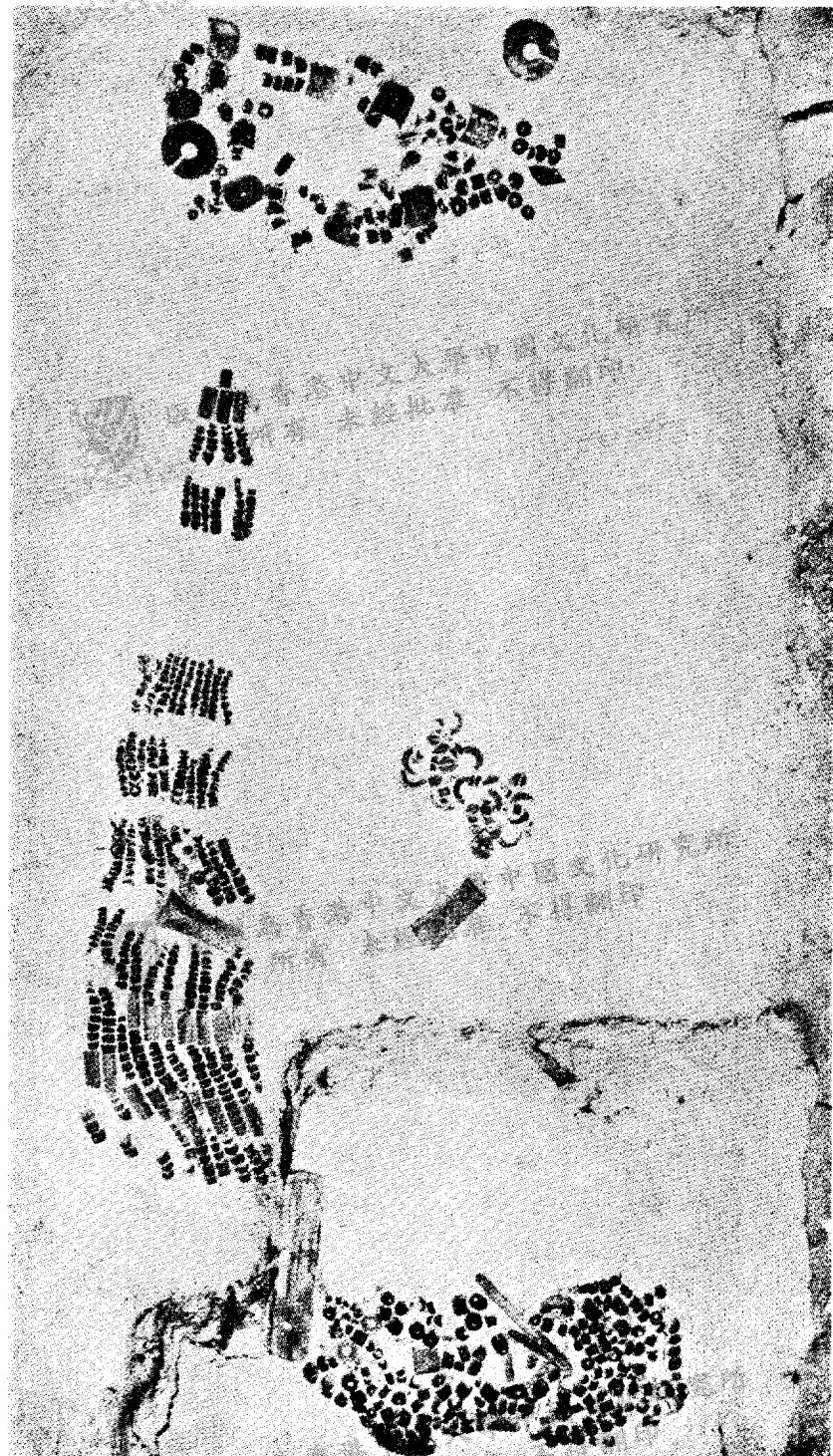
圖九 上村嶺銅器紋飾

圖一〇 銅鏡與銅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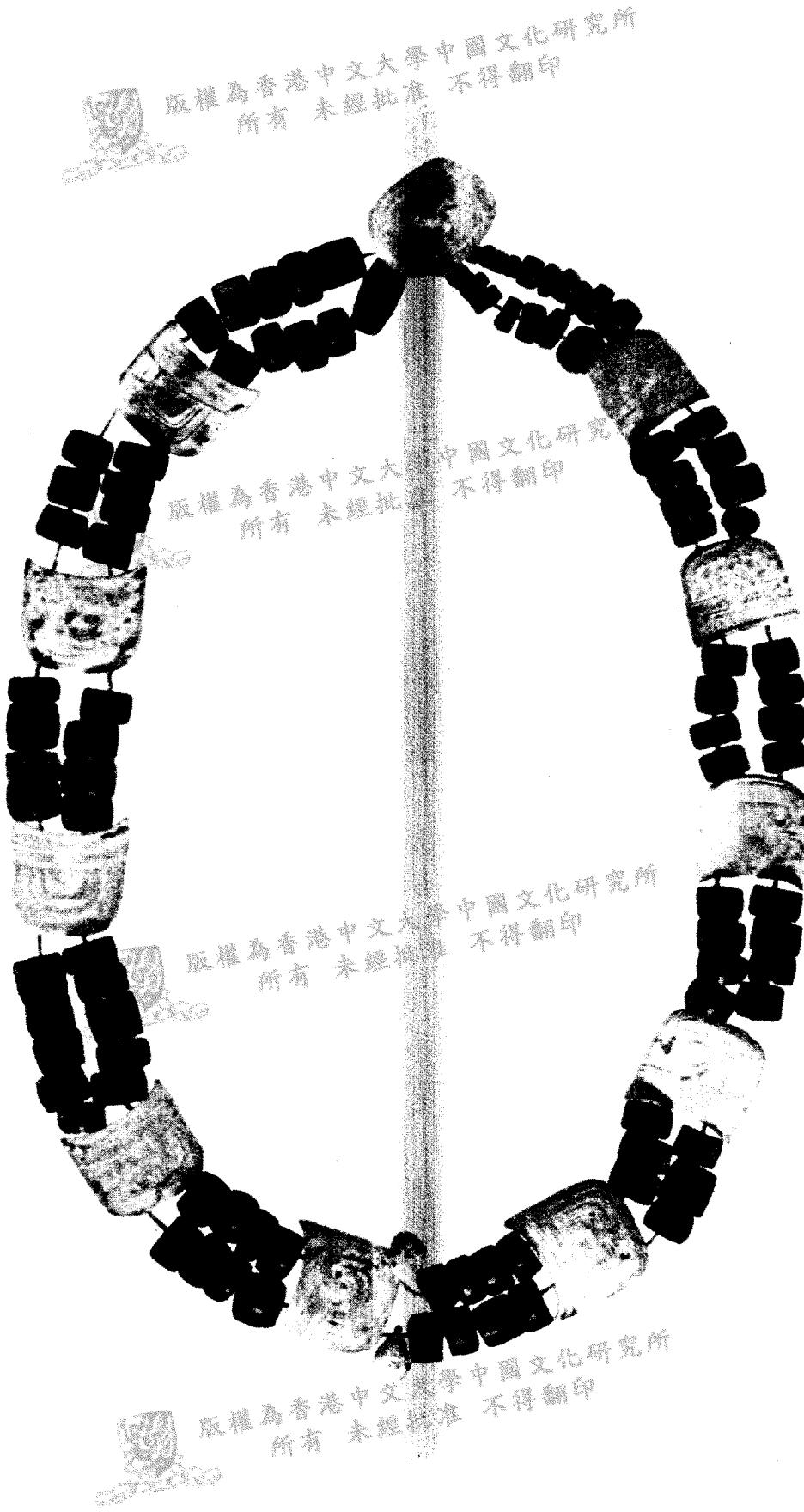


圖一〇 銅鏡與銅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 所有玉石串飾出土情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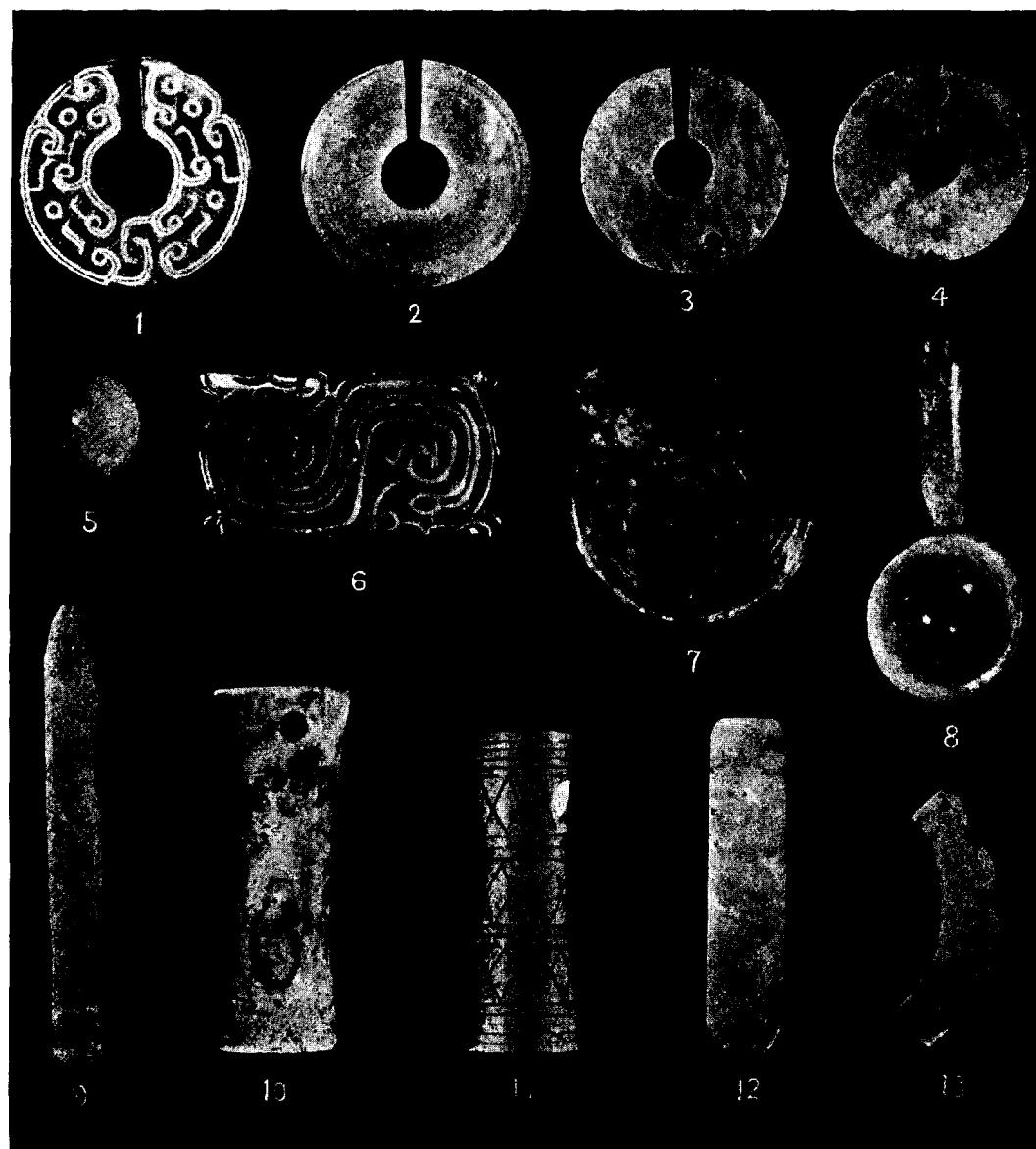


圖一 所有玉石串飾出土情況



圖一二 雞血石項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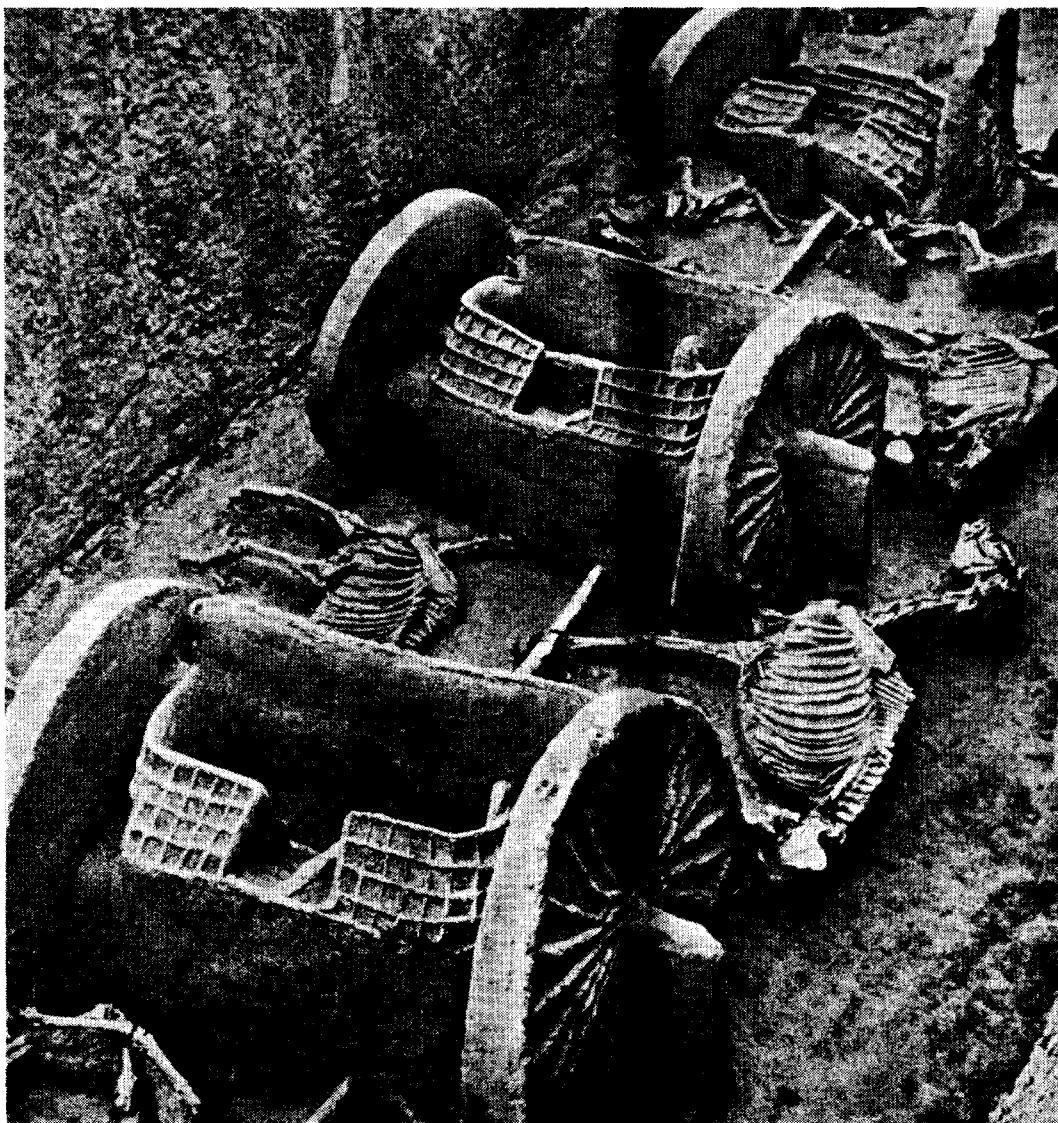
圖一三 上村嶺玉石器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三 上村嶺玉石器研究所

圖一三 上村嶺玉石器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四 上村嶺木車遺迹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四 上村嶺木車遺迹

圖一四 上村嶺木車遺迹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五有上嶺木車復原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